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何 权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3日

摘 要

长期以来, 翻译研究以译文和原文的对等关系为核心, 译者常被视为忠实再现意义的“中介”, 其主体地位在理论层面长期受到遮蔽。随着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向, 译者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 译者主体性问题成为翻译理论的重要议题。认知语言学以“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为基本立场, 强调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主体经验、概念结构与认知机制, 为重新理解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能动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立足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语义观, 结合概念整合理论, 系统阐释译者主体性的认知根源, 揭示译者在意义解构与译文建构过程中的认知操作机制, 并进一步从语言范畴与非语言范畴两个层面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体现。本文旨在说明,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审视译者主体性, 不仅符合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也深化了对翻译本质的理解。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译者主体性, 概念整合, 翻译研究范式, 意义建构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Quan 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il 25, 2026; accepted: June 11, 2026; published: June 23, 2026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centered on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with the translator often regarded as a “mediator” who faithfully reproduces meaning; as a result,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has been theoretically obscured. With the paradigm shif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translator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background to the foreground, and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translation theory.

Grounded in the fundamental tenet that “languag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ognition”, and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embodied experience,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einterpreting the translator’s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and semantic view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drawing on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cognitive underpinnings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reveals the cognitiv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involved in meaning deconstruction and target-text constructi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in concrete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both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dimensions. This study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examining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not only aligns with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ut also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Conceptual Blending,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Meaning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翻译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译文应当如何忠实再现原文意义”上，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各种对等理论，其共同特征都是将翻译视为一种以原文为中心的语言转换活动[1][2]。在这一框架下，译者往往被隐喻为“透明的媒介”或“忠实的复写者”，其主观能动性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否定[3]。

然而，随着文化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社会学取向在翻译研究中的兴起，学界逐渐意识到：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替换，而是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语境的意义重构活动[4][5]。译者不再只是被动执行规则的技术人员，而是参与意义生成的重要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译者主体性”逐渐成为翻译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与此同时，认知语言学在语言学界迅速发展，其以体验性、具身性和使用为本的语言观，对传统的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理论形成了重要挑战。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而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组成部分；意义不是客观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而是在具体语境中由认知主体建构出来的。这一理论立场与当代翻译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主体中心”的趋势在根本上是同构的。

基于此，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系统探讨译者主体性问题，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翻译研究从“译作”到“译者”的转向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第二，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和语义观如何为译者主体性的合理性提供认知依据？第三，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通过怎样的认知机制得以实现的？通过上述探讨，本文希望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一个具有解释力的认知语言学框架。

2. 翻译的转向

从历时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文本中心”到“主体中心”的重要转向。早期翻译理论，无论是西方的圣经翻译传统，还是中国的“信、达、雅”标准，本质上都以译文是否忠实再现原文为最高评价尺度。这一时期的翻译观隐含着一种“客观主义”假设，即原文意义是稳定的、可被完整转移

的，译者的任务只是尽可能减少“失真”。

20世纪中叶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兴起，使翻译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深受形式主义思维的影响。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虽然引入了读者反应这一维度，但仍然以实现“功能对等”为目标，译者的角色依旧主要被限定为技术性的“调节者”。

真正意义上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图里、多斯特尔等为代表的描写翻译学派，将研究重心从“应当如何翻译”转向“实际上如何翻译”，译者的选择、规范意识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开始进入理论视野[4]。随后，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和巴斯内特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指出，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思想、诗学规范和权力结构的制约，译者并非中立的传声筒，而是参与文化生产的能动主体[5]。

可以说，从“译作”到“译者”的转向，是翻译研究范式由语言内部研究迈向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学并未退出翻译研究舞台，而是以新的理论形态重新介入。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与认知、经验和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为解释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行为提供了新的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看，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译者主体性，并非对翻译研究传统的背离，而恰恰是对“翻译研究应与语言学理论发展保持同步”这一学术传统的继承和深化。认知语言学所提供的不是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一种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生成机制的整体性视角，使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具有更加坚实的认知基础。

3. 翻译研究的多元范式及其局限

随着翻译研究不断发展，认知语言学逐渐成为解释译者主体性的重要理论路径。该理论强调翻译并非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基于经验、图式与概念系统进行的意义建构过程。然而，翻译不仅是认知活动，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与历史活动。因此，将认知语言学与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阐释学等视角下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其贡献与局限。

3.1.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目的性与交际功能。Reiss 和 Vermeer 提出的目的论认为，译文应服务于目标语环境中的交际目的，译者需要根据读者需求与翻译任务进行策略选择[6]。Nord 则进一步提出“忠诚原则”，强调译者需要在原作者、读者与委托方之间保持协调[7]。

相比之下，认知语言学更关注译者内部的认知加工过程。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指出，人类的抽象思维依赖于身体经验与概念映射[8]。在翻译中，译者需要基于自身认知图式，对原文意义进行重新概念化。因此，功能主义主要解释“为什么这样翻”，而认知语言学则更关注“译者如何这样翻”。不过，认知语言学对于翻译行为中的交际目的与社会功能关注相对不足。例如，在政府公文或法律翻译中，译文往往受到目标语规范与传播目的的限制，仅从认知层面难以充分解释其翻译策略。

3.2. 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社会学翻译研究强调翻译活动受到社会环境、文化规范与时代背景的影响。Bourdieu 提出的“场域”与“惯习”等概念，被广泛用于解释译者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选择[9]。Inghilleri 认为，译者的翻译实践并非完全个人化，而是会受到社会规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10]。

认知语言学则更强调译者作为认知主体的主动性，认为译文差异来源于不同的经验结构与概念化方式。然而，仅从认知角度解释翻译仍然有限。例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译本之所以呈现不同风格，往往不仅与译者个人认知有关，也与时代审美和文化接受环境有关。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虽然强调外部因素，却较少解释译者具体的心理加工过程。即使处于相同社会环境中，不同译者仍可能产生不同译文。

3.3. 阐释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阐释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首先是一种“理解”活动。Steiner 认为, 翻译本质上是对文本意义的解释与再表达[11]。Gadamer 认为, 理解并不是对文本意义的被动接受, 而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12]。

在这一点上, 认知语言学与阐释学具有相似性。二者都反对“意义固定”的传统观念, 都强调译者主体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认知语言学中的体验哲学同样认为, 意义来源于人的身体经验与认知活动[8]。

但二者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阐释学更强调理解的历史性与哲学性, 而认知语言学则试图通过隐喻、图式与概念化等机制, 对翻译中的意义生成过程进行具体解释。因此, 阐释学能够说明译者为何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 而认知语言学则进一步解释这种主观性如何形成。

3.4.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总体而言, 认知语言学突破了传统“语言对等”观, 将翻译视为动态的意义建构过程, 并重新强调了译者主体的重要性。在解释隐喻翻译、文化意象翻译以及译者选择机制等方面, 认知语言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过, 认知语言学主要关注译者的认知过程, 对于翻译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历史差异解释相对有限。

因此, 认知语言学更适合作为一种解释译者内部认知活动的理论, 而功能主义、社会学与阐释学则能够从交际功能、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等角度进行补充。不同理论之间并非相互排斥, 而是能够形成互补关系, 从而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活动。

4. 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 其核心主张在于突破将语言视为独立形式系统的结构主义传统, 从人类认知活动的整体框架中重新理解语言的本质。与生成语言学强调语言的自主性不同,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并且人类认知建立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经验的基础之上。[13]。这一理论立场为语言意义的理解方式、语言结构的形成机制以及语言使用的解释路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4.1. 具身认知

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本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 语言根植于人类的具身经验。Lakoff 和 Johnson 在“体验哲学”框架下指出, 人类的概念系统并非纯粹抽象的逻辑结构, 而是建立在身体与环境互动的经验之上。知觉方式、运动经验、空间定位以及社会互动模式, 共同构成了人类概念化世界的基础, 而语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8]。

在这一视角下, 语言能力不再被视为独立于一般认知能力的特殊模块, 而是与注意、记忆、分类、推理等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13]。语言结构中的许多规律——例如空间隐喻、方位词用法、时间表达方式等——都可以追溯到人类身体经验的投射模式。

具身认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语言意义来源”的理解。意义不再被视为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 而是认知主体基于身体经验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结果。这一观点为后续的语义理论和语用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 具身认知理论至少提供了一项关键启示: 语言表达背后所依托的经验基础并非普遍一致, 不同语言文化中人们的经验关注点和概念化路径存在差异。因而, 跨语言意义传递并不是单纯的形式转换, 而涉及不同经验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调适。这一认识为后文讨论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提

供了认知前提。

4.2. 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

如果说具身认知揭示了语言的经验根源，那么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则从意义层面进一步体现了其与形式主义语言观的根本分野。

在传统形式语义学框架中，意义往往被界定为与真值条件相关的抽象关系，语言分析的重点在于描述句子在逻辑空间中的真假判断。然而，认知语言学对这种“去主体化”的语义观提出了系统性质疑。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并非脱离使用情境而存在的抽象对象，而是认知主体在具体语境中通过概念化活动建构的结果[13]。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语义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首先，语义是主观化的。语言表达不可避免地带有说话者的视角、情感态度和评价立场。同一客观事件，在不同主体的叙述中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侧面。其次，语义是百科全书式的。词语和句子的意义不仅包含字典义，还涉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知识、社会规范、情感联想和价值判断[14]。例如，“家”这一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联想范围就存在显著差异，其意义远超“居所”这一物理属性。再次，语义是动态生成的。意义并非在语言形式中预先固定，而是在具体语境中通过认知主体的解释活动不断被激活和调整。语言理解因此成为一个持续的认知过程，而非一次性的解码行为。

这一语义观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从翻译研究角度看，这意味着意义不再被视为可以简单“转移”的客体，而是需要在新的语言文化语境中重新建构的认知产物。这一认识为后文关于译者在意义重构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接口。

4.3. 概念整合理论

在认知语言学众多理论中，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为解释复杂意义生成机制提供了尤为精细的分析框架。Fauconnier 和 Turner 指出，人类在理解语言、进行推理和进行创造性表达时，往往不是简单地在既有概念之间进行对应，而是通过多个心理空间之间的动态互动，构建新的意义结构[15]。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本模型包括四个核心成分：两个或多个输入空间、一个共通空间以及一个整合空间。在认知加工过程中，来自不同输入空间的要素被选择性投射到整合空间中，并在此形成新的、具有涌现性质的意义结构。这种新意义往往无法还原为原有输入意义的简单叠加，而体现出明显的创造性特征。

该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语言中的隐喻理解、讽刺解读、语义创新以及跨领域概念映射提供了统一解释框架。例如，当人们将“时间”理解为“流动的河流”时，并非简单使用隐喻表达，而是在“时间经验空间”和“空间运动经验空间”之间进行概念整合，从而生成具有认知说服力的新意义结构[15]。

从语言理论层面看，概念整合理论进一步强化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立场：意义不是静态实体，而是动态生成过程；语言使用不是规则套用，而是认知创造。

在翻译研究中，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翻译活动涉及不同语言文化中概念体系的互动，其本质并非单纯的符号替换，而是跨认知空间的意义重组。概念整合理论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认知模型基础，也为后文讨论翻译中意义建构机制奠定了理论前提。

5. 译者主体性

5.1.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在翻译活动中，原文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交际三元关系。然而，这种三元结构

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链条，而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意义协商机制。尽管原作者是意义生产的起点，译语读者是意义接受的终点，但真正承担“跨文化意义传播”功能的核心角色是译者。正如王正良和马琰所指出的那样，在翻译交际结构中，“译者主体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主体”，因为只有通过译者的理解、判断与重构，原作的意义才可能在另一语言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16]。

从理论层面看，译者主体性并不是对传统“忠实原则”的否定，而是对其内涵的深化。传统翻译观往往将忠实理解为对原文意义的最大限度复制，这一理解隐含着一个前提：意义是稳定的、客观的、可转移的实体。然而，认知语言学对意义本质的重新界定动摇了这一前提。意义不再被视为语言形式的附属物，而是认知主体在特定语境中通过概念化活动建构的结果[13]。因此，翻译不再是意义的“搬运”，而是意义的“再认知化”和“再语境化”。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译者主体性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译者是意义理解的主体。原文并不天然地“包含”意义，意义需要通过译者的认知加工才能显现。译者在理解原文时，会调动自身的语言知识、百科知识以及文化经验，对原文想要表达的意义进行识解。例如，同一文本中的隐喻、反讽或文化暗示，不同译者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并非能力高低的简单体现，而是不同认知背景和解释路径的结果。

第二，译者是意义重构的主体。理解只是翻译的第一步，真正体现主体性的环节在于译者如何将已理解的意义转化为目标语中可接受、可理解的表达形式。这一过程涉及对目标语读者认知期待的预判，也涉及对语言资源的创造性调配。译者在此并非简单遵循既定规则，而是在多种可能方案中做出主体性选择。

第三，译者是意义责任的主体。译文一旦进入目标语文化场域，便承担着社会传播和文化建构的功能。译者不仅要原作者负责，也要对译语读者负责，更要对跨文化交流的效果负责。这种多重责任使译者不可能成为“隐身人”，而必然以主体身份参与意义生产。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译者的认知建构活动之中。译者主体性并非外加于翻译过程的伦理标签，而是翻译作为认知活动的内在属性。

5.2. 译者主体性的认知基础

译者主体性之所以在理论上成立，根本原因在于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和意义本质的重新界定。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符号系统，而是人类认知系统的一部分；意义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认知主体在特定语境中对经验的概念化结果[8]。这一立场为译者主体性的合理性提供了坚实的认知基础。

首先，从意义的不确定性来看，译者主体性具有必然性。任何语言表达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其意义只有在具体语境和具体认知主体的参与下才能得以确定。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文意义的解释者，又是译文意义的设计者。如果否认译者的主体地位，就等于假设意义可以在没有主体参与的情况下完成跨语言迁移，而这一假设在认知层面是难以成立的。

其次，从认知差异性来看，译者主体性具有合理性。不同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经验方式不同，不同文化对同一现象的关注焦点也不同。译者正是处在两种认知体系的交汇点上，其任务不是消除差异，而是通过认知调适使差异变得可理解。翻译研究如果忽视译者的认知过程，就无法解释翻译结果的多样性，更无法说明为什么“同一原文可以有多种合理译本”。

再次，从意义建构的动态性来看，译者主体性具有功能性。翻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机械操作，而是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认知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反复回到原文，对先前的理解进行修正；同时也会根据译文整体效果，对局部表达进行重新安排。这种循环往复的认知活动，本身就体现了译者在

意义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因此，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译者主体性并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妥协，而是翻译活动在认知层面的必然要求。否认译者主体性，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无法解释翻译的真实运作机制。

5.3. 概念整合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认知语言学诸多理论中，概念整合理论为揭示译者主体性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尤为清晰的解释框架。该理论认为，人类在理解和表达意义时，往往通过多个心理空间之间的互动，将来自不同来源的概念要素进行选择投射和整合，从而生成新的意义结构。

将这一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可以更加具体地说明译者主体性如何在认知层面展开。翻译活动至少涉及四类关键心理空间：源语文本空间、源语文化空间、译者经验空间和目标语文化空间。译者在理解原文时，需要在这些空间之间不断切换，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

具体而言，译者主体性在概念整合中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选择性投射体现主体判断**。原文所激活的概念空间包含大量信息，但译者不可能也不需要将所有信息等量投射到译文中。哪些意义要素需要保留，哪些可以弱化，哪些需要补充说明，都取决于译者对交际目的和读者需求的判断。这种选择性投射正是译者主体性最直接的体现。

第二，**跨文化映射体现主体调节**。在概念整合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比较源语文化空间与目标语文化空间之间的差异，对原文概念进行再定位。例如，某些在源语文化中具有积极评价的概念，在目标语文化中可能带有中性甚至负面色彩，译者必须通过重新整合避免意义偏移。这一过程离不开译者的文化判断能力。

第三，**新意义生成体现主体创造**。整合空间中的意义结构并非简单叠加，而往往具有新的涌现属性。译文中的某些表达方式，在源语中并不存在，但却能更有效地实现原作的交际功能。从认知角度看，这种创造性并非主观随意，而是概念整合机制的自然结果。

正如金胜昔和林正军所指出的那样，翻译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双重整合”活动：译者在理解原文时进行第一轮整合，在生成译文时进行第二轮整合。正是在这两轮整合的持续互动中，译者主体性得以稳定而系统地发挥作用[17][18]。

6.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发挥

6.1. 语言范畴下的译者主体性

在语言范畴层面，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形式的认知调适上。这种调适并非机械性的“语法修正”，而是基于两种语言在概念化方式上的差异所进行的系统性重构。

6.1.1. 词类转换中的认知取向

英汉两种语言在事件表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英语更倾向于通过名词化结构呈现抽象过程，而汉语则更强调动作性和过程性。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语法现象，而是反映了不同语言对事件结构的认知偏好。

例如：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company surprised everyone.

公司迅速**扩张**让所有人感到惊讶。

在这一转换中，“expansion”由名词转为动词“扩张”，并非出于形式对等的需要，而是基于汉语

对事件动态性的突出倾向。译者在此所做的，并不是简单遵循某条“翻译技巧”，而是在比较两种语言认知模式后，对表达方式做出的主体性选择。

从认知角度看，词类转换实际上是事件构式的重新配置。译者通过改变句法结构，引导读者以更符合目标语习惯的方式对同一事件进行概念化，这正是译者主体性在微观层面的体现。

6.1.2. 语态转换中的视角调控

语态的选择本质上涉及对事件参与者的关注焦点。英语中被动语态使用频繁，强调事件结果或受事者；汉语则更倾向于通过主动结构呈现事件的整体过程。

例如：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 father.

他深受父亲的影响。

在这一转换中，译者将被动句转换为主动表达，并非只是出于语法习惯的考虑，而是在进行视角调控。通过突出“他”的体验状态而非动作施事，译者引导读者以更符合汉语叙事风格的路径理解事件。

这种视角调控体现了译者在信息结构安排上的主体性。译者并不是被动接受原文的视角，而是根据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期待，对事件进行重新聚焦，从而实现意义呈现方式的优化。

6.2. 非语言范畴下的译者主体性

如果说语言范畴主要体现译者在语言形式层面的主体调适，那么非语言范畴则更集中地展示译者在文化和认知层面的主体建构。

6.2.1. 范畴错位中的主体调节

不同文化中，同一概念范畴的原型成员的文化内涵往往并不一致。中英文中“牛”和“horse”的对比正是一个典型例证。在汉语文化中，“牛”作为力量和能力的象征，具有明显的积极评价意义；而在英语文化中，“cow”更多是中性甚至略带贬义的形象，真正承担“强壮”象征功能的是“horse”。

当译者面对“他真牛”这样的表达时，如果仅从词汇对应关系出发进行直译，必然导致意义偏移。译者需要站在目标语文化的认知范畴体系中，对“力量”“能干”这一抽象概念重新定位，选择更具功能对等效果的表达方式，如“He is really strong”或“He is as strong as a horse”。

这一过程实际上体现了译者在概念范畴重构中的主体性。译者不是在寻找表层对等，而是在进行深层认知映射，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激活相似的评价框架。

6.2.2. 文化空缺中的主体建构

在某些情况下，目标语文化中甚至不存在与源语文化相对应的概念范畴，这时译者主体性就表现为更为明显的“建构性介入”。

例如汉语中的“龙凤之人”，其意义不仅包括“杰出”，还包含着吉祥、尊贵和家族荣耀等复合文化意涵。然而在英语文化中，“dragon”并不承载相同的象征体系，甚至可能引发负面联想。若简单直译，译文读者不仅无法获得原文的积极评价效果，反而可能产生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通常需要采取意义展开策略，将隐含的文化内涵显化为目标语读者可理解的描述性表达，如“an outstanding and highly respected person”。这种做法在形式上增加了原文中未明说的内容，但在功能上却更接近原文的交际意图。

从认知角度看，这种“增译”并非随意添加，而是译者在面对文化空缺时，通过概念整合对意义结构进行的必要重建，体现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责任。

6.3. 体验效果再现中的主体责任

金胜昔和林正军指出,译者的根本任务不是复制语言形式,而是尽可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体验效果。这一观点从认知层面揭示了译者主体性的价值核心:翻译的终极目标不是形式对等,而是体验对等[17][18]。

体验效果并非客观可测的实体,而是读者在理解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心理反应,包括情感态度、价值判断和审美体验。译者在追求这种效果时,必须综合考虑语言因素、文化因素和读者因素,其决策过程本身就是高度主体化的。

因此,无论是在语言范畴还是非语言范畴,译者主体性的核心都不在于“是否忠实”,而在于“如何在认知和体验层面实现忠实”。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真正的忠实是一种动态平衡,而译者正是这一平衡的关键调节者。

7. 结语

随着翻译研究由“文本中心”向“主体中心”的转向,译者主体性已逐渐成为理解翻译本质的重要理论维度。然而,若仅从伦理、文化或社会层面加以阐释,仍难以充分说明译者何以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基于此,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系统阐述,力图为这一概念提供更为坚实的认知基础。

认知语言学关于具身认知、百科全书式语义以及意义动态生成的理论表明,语言并非自足系统,意义亦非可以简单转移的客体,而是认知主体在具体语境中通过概念化活动不断建构的结果。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译者主体性不再被视为对“忠实原则”的偏离,而是翻译活动在认知层面的内在要求。译者之所以不可替代,正是因为翻译并不是符号之间的机械转换,而是跨语言、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重构过程。

借助概念整合理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翻译活动涉及多个心理空间之间的持续互动与整合,译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解、判断与选择,其主体性既体现在对原文意义的把握之中,也体现在对译文表达方式的创造性调节之中。这表明,译者主体性并非抽象的理论口号,而是贯穿于翻译认知全过程的现实存在。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也有助于重构“忠实”与“创造”之间的关系。二者不再是彼此对立的价值取向,而是统一于意义建构这一核心认知活动之中。译者不再只是“忠实的传声筒”,而是意义跨文化迁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认识主体和文化中介。这一认识,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认知基础,也为理解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创造性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

参考文献

- [1] Catford, J.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Nida, E.A. (198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rill Academic Pub.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669147>
- [3]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4]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btl.4>
- [5]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inter.
- [6] Reiss, K. and Vermeer, H.J. (2014)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Skopos Theory Explain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59715>
- [7] Nord, C. (2001)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t. Jerome Publishing.
- [8]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 [9]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1503621749>

-
- [10] Inghilleri, M. (2005) The Sociology of Bourdie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The Translator*, **11**, 125-145. <https://doi.org/10.1080/13556509.2005.10799195>
- [11] Steiner, G. (1998)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2] Gadamer, H.G. (2004) *Truth and Method*. 2nd Edition, Continuum.
- [13] Langacker, R.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5331967.001.0001>
- [14] Evans, V. and Green, M.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15] 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Basic Books.
- [16] 王正良, 马琰. 译者主体性的多维度构建与博弈[J]. 外语教学, 2010, 31(5): 107-110.
- [17] 金胜昔, 林正军. 识解理论关照下的等效翻译[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2): 119-123.
- [18] 金胜昔, 林正军. 译者主体性建构的概念整合机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1): 116-121, 149-150.